

世纪末浪潮

——近十年台湾文学走向

□朱双一

自 70 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后走过了 20 年历程的台湾文学, 和整个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一起, 即将跨入 21 世纪。

笔者虽非预言家, 但从本世纪最后 20 年、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文学的变化看, 或许也能试着勾勒出台湾文学在跨越世纪时, 其发展的大致轮廓和趋向。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 “政治文学”的崛起是近 20 年台湾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它使台湾文学赫然增加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在 80 年代以前的“威权时代”, 台湾虽然有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 但实际上并没有以国民党专制统治为直接批判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学”。80 年代后, 所谓“牢狱文学”、“人权文学”、“二二八小说”以及“50 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的出现, 才宣告“政治文学”的真正诞生。这些文学虽然隐含着某种“统”、“独”之分野, 但都以突破当局数十年的政治禁忌、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目标和特征。然而随着 80 年代后期的“解严”以及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二二八事件平反等所谓“民主化”进程, 上述文学因其抨击对象的似乎消失, 而一下

子失去其政治批判的着力点。进入 90 年代的“政治文学”, 也因此面临着新的转折。顺时应势, “政治文学”将着眼点从“历史”转向了“现在”, 主题从揭示政治“压迫”转到了揭示政治“乱象”。笔者所谓“时政文学”的出现, 即这种转折的表现。这种“时政文学”直接取材于当前政治人物的行迹以及刚发生、正在发生、臆测中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1994 年前后, 因台湾当局的错误言行导致两岸关系紧张时出现的《一九九五闰八月》等一大批假想大陆武力攻台情景的畅销书; 张大春以刚发生的真实事件“尹清枫命案”及其牵连的军购弊案为题材的《没人写信给上校》; 1996 年 3 月所谓“总统”选举前夕出现的与选举紧密相关的张大春《撒谎的信徒》、宋泽莱《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王定国《台湾巨变一百天》等; 乃至近两年大量出现的呈露、揭发或影射具有一定知名度政治人物的隐私, 从而鼓动政坛风云的所谓“八卦”作品, 均属此类。须指出, 近年来台湾政治文学的主流和焦点, 从反专制、争民主逐渐转向对于社会政治乱象的反映和一种乱世愤情的表达, 是和台湾政治结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

的,由于台湾当前社会政治生态和环境在短期内并不会太大的改变,因此“政治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向,还将延续下去。

近20年来台湾作家在政治层面上最大的分歧和争执,莫过于“统”、“独”之争,如80年代初即有所谓“中国结”和“台湾结”、“第三世界文学论”和“台湾本土文学论”等的论争。由于种种原因,随着所谓“本土化”、“自主性”、“台湾民族”、“台语文学”、“独立文学”等含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的不断提出,“独派”阵营似乎一度气势旺盛。然而近年来,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陈映真、吕正惠等为代表的文坛“统派”力量面对“台独”思潮在岛兴风作浪的严峻形势,奋起主动出击,从理论上痛加批判,对“独派”形成强大冲击,在文坛树立起反“台独”的鲜明旗帜。其中较集中、明显的对抗有:1995年台大教师陈昭瑛得到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等呼应的、与若干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外文系教师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论争;1997年因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引发的由原乡土文学分裂的“统”、“独”阵营的对峙;以及1998年陈映真、吕正惠等对于张良泽“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等。值得注意的,在这些斗争中,一些年轻的学者如陈昭瑛、陈光兴等,成为挑战“台独”派论述霸权的生力军。陈映真因此断言:“对于知识、理论和逻辑粗疏,却充满法西斯独断和基本教义狂热的台独派诸论述,年轻的、前进的学界正开始批判的、比较科学的质问。”^①年轻一代的挺身而出,正显示了反“台独”论述发展壮大的前景。与此相反的,无论在实际创作或理论论述上,台湾文坛曾一度兴盛的本土意识、分离意识乃至“台独”论调,正趋于软化和淡化。其原因,除了“台独”论调本身理论上的贫瘠、非正义性、以及其教义性与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外,似乎也是一种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思潮发展相契合的必然趋势。

其次从经济层面看,相应于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社会的都市化发展,“都市文学”一度成为文坛最强大的潮流。年轻一代的作家,成长、生活于都市,与都市已融为一体,他们当中富于都市文化意识的一群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正面之肯定,乐于接受它所提供的方便快捷的生活节奏和种种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伸出双手拥抱都市,赞颂着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勇于竞争、精明干练的新人格,有的还敏锐感应着台湾在某些层面出现的后工业文明状况,大胆

引入西方后现代主义。

不过“都市文学”近年来似乎已有所回落,这固然与都市文学的两位旗手黄凡的封笔、林耀德的早逝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所致。都市文明的进展伴随着交通、环境、治安等种种触目可见的社会弊端,影响更为深远且日趋严重的则是“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物化倾向。一些作家对此忧心忡忡。但不同于早些时候乡土文学以阶级论为武器对“都市”进行的剔骨挖疽式的直接揭发和批判,这批更年轻的作家对于都市文明的质疑,采用了人性和物性、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的视角,这就构成了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样面对都市的种种善与恶,人文主义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区别,在于后者留恋田园,想以乡村对抗都市,传统对抗现代;前者却欲以知识、理性之光照耀人的心灵,通过富有人性和人文内涵的描写,为社会注入高品味的文化营养。不像批判性文学的咄咄逼人和采用政治、经济手段的疗治,人文主义显得更心平气和些,并试图改以“文化”的手段来获取最佳的疗效。

这种新人文倾向的创作,近年来在台湾文坛日益高涨。除了刘克襄等的自然生态写作、林清玄等的禅理散文作品外,庄裕安的旅游和聆乐散文、鸿鸿的影剧艺术赏析散文等人文知识性写作,也具有针对后现代思潮所带动的文化否定主义风气的反拨意义,是作者们实现以“文化”挽世道之衰颓的有益尝试。人文主义对于台湾文坛的一个明显的贡献,是对于曾一度汹涌澎湃的大众消费文化潮流的某种程度的遏制和削减。1990年前后,大众消费文化对于文学的冲击曾使文坛深受困扰,成为作家、理论家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近几年这一话题的渐归沉寂,并不完全是理论界的喜新厌旧,而是在严肃文艺界的自觉抵制下,大众消费潮流的影响有所减弱,严肃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重新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人文精神发挥了它的特殊的功用。

台湾文坛这新一轮人文主义倾向的创作,与其作者作为新世代作家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这些作者不同于战乱中成长的前行代,已有条件接受较完整的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素养;其创作既不像乡土文学受制于时代变迁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同时又代表着现代都市人在物化环境中的某种精神追求。因此,这种新人文倾向的创作,无疑具有较大的发

展潜力。

其三,从社会结构的层面看,近年来台湾文坛的一个明显趋向,即“边缘”的崛起。它是80年代台湾社会和文坛多元化趋向的延续和强化。虽然后现代思潮的风光已减,但它所宣扬的多元化、去中心等理念,却已生根蔓延。在不少台湾年轻作者心目中,边缘的、地下的、民间的、异端的、非主流的事物,才充满生机和力量、具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冲破各种桎梏,解构固有的中心“霸权”,产生革命性、创造性的成果。为此,他们常以“边缘”自居,据此展开对“中心”的进逼和颠覆。

台湾文坛对于“边缘”议题的开发,有着多种角度或切入点。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有与台北大都市文化中心相对的地方文学、文化的倍受重视,甚至形成经久不衰的乡土文史热潮。陈黎等认知花莲文化孕育于奇山秀水、包容不同族群的独特气质,致力于推动边缘地区文学发展的努力,仅是其中一例。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着眼,有相对于福佬族群的、处于台湾族群图谱“边缘”的所谓“弱势族群”的文学,如原住民文学、眷村文学、客家文学等。特别是前者,代表着一个在长期不平等族群关系下,似乎早已喑哑无声的边缘族群的系统发言,表达了他们的抗争或更深沉的文化扎根的企望。眷村小说则表达了外省赴台人员的后代,对于早已沦为弱势的“外省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的关注。从性别角度入手,则有试图瓦解现行的男权社会和异性恋中心体制的女性主义文学、(同性恋)“同志”文学等。

“边缘”的崛起使近年来的台湾文学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并以其蚕食、瓦解中心的较强革命性,对今后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它自己也显示着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四,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看,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坛,出现了“文学文化化”、“文学哲学化”的明显趋向。如果我们用“多元化”来概括近20年台湾文学发展的形式特征,那用“文学文化化”来概括其内涵特征,并不为过。而且这一倾向是和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相吻合的。一方面,作家和理论家们热衷于将外国(包括西方和第三世界)新兴的哲学、文化思潮,诸如依赖理论、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论述、新历史主义、全球化思潮等等,同步或准同步地引入台湾文坛,并使之对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

评产生实际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实际创作中,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蕴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关注和努力,甚至使他们忽略或放松了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语言修辞等固有的文学追求。只要看看乡土文学论战时,王拓还宁愿取“现实主义”这样包含政治意涵但毕竟较为规范的文学学术语,而不愿使用“乡土文学”这样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概念;但到了80年代,林耀德等年轻作家却宁愿打出“都市文学”的旗号,即如“后现代主义”,主要也是将它当作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文学概念来使用的,就可体会其间某种微妙而又明显的变化。1990年前后台湾文坛出现的三个创作风潮,即模仿马奎斯的“魔幻写实”,向原始神秘的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纵笔的“仿马潮”;模仿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充满大言汹汹的涉及文化、哲学广泛问题的雄辩议论的“仿昆潮”;以及不断暴露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过程,对媒体和语言的反映真相功能加以质疑的“后设潮”,则是实际创作中的例子。在出版方面,导引生活、涉及人生文化方方面面的励志散文、禅理作品等,占有极大的市场份额。正如初安民所说:“举凡政治的、宗教的、演艺的,等等,都以迹近文学形式的包装,拓展了文学的可能领域,同时也混淆了文学的界定内容。”^②

在此“文学文化化”的潮流中,依赖理论、后殖民论述和全球意识的出现,是一条颇值得注意的理论脉络。全球化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动向之一。这一潮流也必然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产生影响。这一议题首先可追溯到80年代初陈映真等从“依赖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引申出来的“第三世界文学论”。这些理论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由“核心”、“半边陲”、“边陲”三层网络所构成,台湾处于这三层网络的“边陲”地带,有必要努力摆脱沦为核心国家之附庸的地位,在文学上则应认同有着相似经历、命运和共同任务的第三世界文学。它和当时彭瑞金、宋冬阳等提出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相抗衡,构成了台湾文坛“中国意识”和偏狭化了的“(台湾)本土意识”的一次交锋。

如果说依赖理论曾作为“统派”作家的理论武器,那90年代被引入的一度颇为热门的后殖民理论,却经常为一些“独派”的学者、作家所利用。而这种利用,由于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前提上,即认为数百年来台湾史是一部被殖民的历史,台湾的历代管辖者(包括明郑、清廷以迄

甫光复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等)均为与荷兰、日本类同的“外来”“殖民”者,这就使得他们围绕语言、历史、身份认同等的论述,常令人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乃至舛错谬误之感。如他们将部分从小习日语的台湾作家,在光复后改学中文而造成创作上的一时困难,等同于殖民地人民的“失语”、“消音”现象,借此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被殖民”的痛苦。这样,后殖民理论并非用来清算美、日等新、老殖民主义在台湾的影响,而是被扭曲为某些人宣扬其分离主义论调的工具。

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发展本身面临瓶颈之时,却又受到了“全球化”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全球意识”(或称“世界意识”)其实在80年代台湾即已出现,特别是在诸如科幻文学、环保文学、多媒体创作等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如黄凡、林耀德的科幻小说、科幻诗常以外太空为场域,以外星人作为假想敌,或表达整个人类为自己的造物物(电脑、机器人等)所控制的异化主题。环保作家韩韩、马以工,则率先发出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警示。热衷于多媒体诗创作的白灵、杜十三,敏感于“早上在东京看朋友,晚上在家看杨贵妃”的新时空感受,甚至萌发了“地球村”、“太阳乡”、“银河国”的憧憬。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全球意识”有增无减。近年来全球资讯互联网的建立,进一步解除了地域之间交往的藩篱,预示着整个文学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从理论上说,全球化趋势和世界意识对台湾目前存在的两种民族主义——陈映真式的中华民族主义和“独派”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都会产生冲击。然而实际上,对后者(即“台湾民族主义”)的冲击更大些。这是因为前者(中华民族主义)早已根深蒂固,而后者本身却是一种偏狭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意识形态,在它尚未成形时即遭冲撞,便有夭折之虞。一些本土意识强烈的台湾作家慨叹:本土意识虽已苏醒,“但我们面临了另一个世界主义的声音”^③,台湾的新新人类称“台湾这么小,逊!地球村才是我们真正的关心”,台湾的历史记忆正逐渐在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脑海中模糊、淡忘^④。不过,势之所趋,这也许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喟叹。

相反,全球意识作为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两岸共同的文化趋向,它为海峡两岸文学、文化的整合,进一步营造了有利的氛围。众所周

知,在两岸关系领域近20年来演示着的一个最重大变化,这就是同根同源的两岸文坛结束了长达30年的隔绝,开始了相互接触和了解。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两岸的社会制度不同,其文学也必然走过了极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都累积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成果和经验。这就提供了两岸文学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必要和可能。如果说最近20年来台湾作家在国家民族认同和艺术观照视角上,存在着“本土”的、“中国”的和“世界”的三种分野,相对而言,持“本土”意识的一脉由于其拘于一隅的偏狭性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舛误性,自行割断了血脉的补充,必然地呈衰颓之势;持“中国”视角的一脉由于极大地扩展了以前被隔绝和阻蔽了的文化视野,力图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当前正方兴未艾;而由新世代作家操觚的、涵纳了“中国”和“本土”并不再是照搬西方的“世界”的视角,由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亦呈上升之势。这就充分说明,所谓两岸的整合并非仅是一个政治性的口号,更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作家无法脱离他立足的土地而升天,无法割断其文化的血脉而存活,也无法自我封闭而发展。显然,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综合的路线,才能为跨世纪的台湾文坛开辟坦荡的前景。

当然,文学的整合最终有待于政治的整合、社会的整合。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文学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命题。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受经济、政治的制约,又可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有时甚至可能走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化的整合,就将成为社会政治整合的先导和基础。今日,人类已叩响了21世纪的门扉。21世纪,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必将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文学也必将实现整合,而跨入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将以其包容着台湾人民特殊经验的多姿多彩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注释:

①陈映真:《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载1995年第4期《海峡评论》。

②初安民:《新品味》,载1992年第2期《联合文学》。

③林金郎:《从本土出发走向世界》,载《文学台湾》第28期,1998年冬季号。

④吕兴昌:《拒绝历史不忆症》,载《文学台湾》第28期。

作者朱双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